

清代中國傳教士培訓基地 澳門聖若瑟修院

夏 泉*

聖若瑟修院“是澳門歷史上最主要的教育中心之一，並於1800年被授予‘皇家修道院’的稱號。”⁽¹⁾ 如果說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創辦主要是為日本培養傳教士，那麼該修院（St. Joseph's College，亦可譯為“聖若瑟神學院”、“聖若瑟學院”、“聖約瑟修院”或“三巴仔修院”）則主要負責培養清代派往中國的傳教士，是繼聖保祿學院之後澳門第二所早期知名的高等學府（在聖保祿學院於1762年停辦之後成為澳門唯一的高等學府），在天主教對華傳播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澳門教育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本文擬分四方面對聖若瑟修院的創辦動機和始末、辦學情況及其主要貢獻等方面進行初步的探討。

辦學動機

聖若瑟修院的創辦主要是為中國副省培養傳教士⁽²⁾，這在當時的文件和後來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均有提及，可佐證這一事實。

如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之〈胥孟德傳〉中稱：“他於1728年至1731年在澳門為中國副省專設的聖若瑟神學院的創始人。”⁽³⁾

又如1783年葡萄牙內閣大臣在給印度總督索薩的指示中稱：“陛下希望在中國穩固建立傳教團，以便為其傳教士提供援助，傳播基督教，使重要的澳門受益。……同時還應委派敏銳之士協助主教，在那裡的聖約瑟修院中設立一個教會學校，如同〈給北京主教〉中的旨意一樣。”⁽⁴⁾

文德泉神父亦稱：“於是，就有了兩個神學院：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兩者都是耶穌會建立的。前者屬於日本大教區，後者屬於中國教區。”⁽⁵⁾

林家駿亦稱：“聖若瑟修院創辦之初，祇可算是聖保祿書院的分院，專為培植中國傳教士用，因

此華人便俗稱它為‘三巴仔’，而稱前者為‘大三巴’。”⁽⁶⁾

創辦始末

耶穌會士對教育非常重視，“為了達到以絕對忠於天主教會的精神教育成長中的一代人之目的，耶穌會士決意把學校教育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們為所轄學校制定了一套精緻而巧妙的、往往十分奏效的天主教式的教育方法。”⁽⁷⁾ 澳門聖保祿學院⁽⁸⁾、澳門聖若瑟修院的創辦都是為了滿足天主教在遠東佈道之需；而為達此目的，一方面通過葡方任命葡萄牙主教，另一方面派遣耶穌會士前往辦學。由於中文資料的零散和匱乏，加之大多數中方學者不諳葡文，學者們對聖若瑟修院知之甚少。對於修院的創辦時間，也是眾說紛紜，有1672年說、1732年說、1749年說、1762年說和1657年說。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一書就記載：1657年2月26日，“耶穌會員們創立聖若瑟神學院。同名教堂於

*夏泉，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和基督教教會教育。本文為暨南大學博士流動基金課題“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教育研究”研究項目論文之一。



澳門聖若瑟修道院教堂（20世紀初） 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

1750年創建。”⁽⁹⁾但實際上，1657年開始籌辦的是聖若瑟教堂，又稱“小三巴”或“三巴仔”（聖保祿教堂俗名“大三巴”），而聖若瑟修院則創辦於18世紀初葉。同時代的龍思泰的記載較為準確：聖若瑟教堂“在奠基石埋下許多年後，直到1758年，耶穌會士還是不能在聖若瑟教堂聽彌撒。”⁽¹⁰⁾可見，直至1758年，聖若瑟教堂經過多年的建設後才告竣工。而聖若瑟修院作為聖保祿學院的分院，早於1728年即開始招生。下述六則史料可以佐證該修院1728年成立的情況：一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載：“1728年2月28日，根據省區副主教若奧·德·薩神父—省區總務長塞格依拉命令，（中國）副教區各神父從聖保祿教堂遷往聖若瑟新堂。”1730年，“有記載說建立不久的聖若瑟神學院的學生們穿上歐洲服裝，以此嘲弄中國官吏的迫害。”⁽¹¹⁾二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之〈秉多傳〉載：秉多於“1728年2月23日成為澳門聖·若瑟新傳教

區的第一任會長，中國副省的耶穌會士們於是便離開了澳門的聖·保祿學院（當時該學院屬於日本省）前往該副省的這一住院。”⁽¹²⁾三是文德泉神父所言：“聖若瑟神學院於1728年的建立是一突出事件，它的目的是為中國培養傳教士。”⁽¹³⁾四是潘日明神父所言：“1728年2月22日，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終於按照北京的聖若瑟教堂模式蓋建了聖若瑟修院教堂和聖若瑟修院。”⁽¹⁴⁾五是翟木在〈聖若瑟修院風彩重現〉一文中指出：“耶穌會士在1728年之後經已在該區居住，並建立修院教育本地及外來的青年學子。”⁽¹⁵⁾六是林家駿根據耶穌會院現存文獻考證後認為：“1722年喬治先生在崗頂建造兩所房舍。他死後，把房子送給耶穌會士，改為聖若瑟會院。1732年再命名為聖若瑟修院，後來逐漸加添樓舍，於1785年建成美侖美奐的修院聖堂，便成為今天的聖若瑟修院。”又稱：“澳門聖若瑟修院，俗稱三巴仔，始建於1727年，是耶穌會士首創的，修院則建於1758年。”⁽¹⁶⁾

以上六則史料表明，聖若瑟修院最早房舍建於1722年，1728年正式創辦修院，修院的命名在1732年；聖若瑟教堂興建於1746年，落成於1758年。

澳門聖若瑟修院自1728年成立以來的歷經了不同的發展時期。林家駿主教在〈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中將其劃分為八個發展階段，即：1728-1762年，由耶穌會會士管理時期；1762-1784年，由教區司鐸管理時期；1784-1856年，由遣使會會士管理時期；1857-1893年，由教區司鐸管理時期；1893-1910年，由耶穌會士管理時期；1910-1930年，由教區司鐸管理時期；1930-1940年，由耶穌會會士管理時期；1940年至今，由教區司鐸管理時期。⁽¹⁷⁾

由於耶穌會被解散，1762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同時被關閉。該院十三名耶穌會士被逮捕。1774年，敵視耶穌會士的祁主教來澳時，修院業已因無修生而淪為孤兒院。這時，羅馬傳信部應法王路易十六請求，委派遣使會來華接替耶穌會傳教與辦學事務。關於1762-1784年聖若瑟修院教學活動停止的情況，大法官拉撒路·達·席爾瓦·費雷依拉在致印度總督的函中有所提及：“耶穌會教士被驅逐後，這裡的學校全部關閉，也不再開設拉丁語、哲學或神學課程。希望學習這些課程的人祇好去馬尼拉、果阿，而川資不足的人祇能留在這裡，去聽年邁的牧師們授課，……薪金五百兩的皇室教師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培養出來。女教徒們是不授課的，而且這些修道院裡也沒有教師，……”《澳門編年史》亦稱：“自1762年至1775年即巴蒂斯達·利馬到達澳門的那一年，連一個教師也沒有。從1775年至1784年，這位薪金豐厚的教師仍然未能培養一個優秀學生。”⁽¹⁸⁾1784年北京教區主教湯士選(D. Alexandre de Gouveia)重新創辦聖若瑟修院為遣使會培養中國傳教士，遣使會代替耶穌會主持修院工作。施白蒂稱：“1784年，同日〔指9月9日〕，遂由聖若瑟學院設立北京主教神學院。(……)1784年10月1日，重開神學院，有學生八名；神學院由拉撒路教士負責管理，自果阿拉撒路率來的曼努埃爾·科雷亞·瓦倫特(Manuel Correia Valente)神父擔任神學院院長。”⁽¹⁹⁾在1783年4

月4日，葡萄牙〈〈王室制誥〉〉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Dom 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之指示)一文中對此事有明確記載：“北京主教滯留澳門期間，將入住聖約瑟修院。如果有些學生希望入讀該教會學校，主教可將其作為隨身僕人收留，以便在前往中國後將其交予該教區樞理，後者在主教離開後，亦可入住聖約瑟修院。”⁽²⁰⁾這是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長卡斯楚以葡國女王唐·瑪麗亞一世(Dona Maria I)名義向印度總督發佈的聖諭(當時澳門為其管轄)。之後聖若瑟修院又幾經坎坷，“到了1823年，因為彼此意見不合，查主教迫走遣使會會士，因此修院的教授又逐漸星散。到了1850年，祇餘下一位年近九十歲的老神父教授拉丁文，修院又再名存實亡了。”⁽²¹⁾1857年1月6日，馬塔主教主持聖若瑟修院重新啟用儀式，准許耶穌會士回修院任職，修院人數一度達377人；1870年9月20日，葡萄牙頒令禁止外籍人士在澳門任職，在該院任職的所有外國教師被勒令離去；1881年12月22日，澳葡政府以法令形式重建聖若瑟修院。⁽²²⁾總之，聖若瑟修院“從1784年起，曾數度易名，包括有‘北京主教管轄御修院’、‘修士團體之家’、‘皇家教育進修所’、‘澳門聖若瑟利宵修院’等，這一系列的名稱，都可見它在天主教和政府培訓人材中佔有重要地位。”直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聖若瑟修院仍辦學不輟。據1893年12月19日《鏡海叢報》報道，聖若瑟修院當時仍有西洋學生十餘人。⁽²⁴⁾1951年後聖若瑟修院最終演變為聖若瑟教區中學。

聖若瑟修院位於澳門三巴仔街的聖若瑟修院教堂內，與東西望洋山遙遙相對，佔地廣闊，在高處可以看到東望洋山與西望洋山。修院按照北京聖若瑟教堂模式蓋建，設計獨特，建築恢宏。教堂中央是一巨形圓頂，光線透過玻璃射入。最特別之處是其平面佈局為一個拉丁十字形，縱軸長22米，橫臂長13.5米，由地面至穹頂的高度為19米。修院氣派不凡，浮雕栩栩如生，是澳門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典範。從1828年起，修院成為澳門青洲島的所有者，“教員們可以在這村野之地度過從8月中旬到10月1日的假期。”⁽²⁵⁾



澳門聖若瑟修院及院內花園一隅（20世紀初）
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

師資、生源和辦學情況

一、師資和修院院長

龍思泰在《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中的〈澳門的羅馬天主教會〉一文中稱：“王家聖若瑟修院的院長，由里斯本選派。”具體選派了多少名院長與教師，所留下的資料卻十分零散。據費賴之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與書目》、榮振華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與書目補編》、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林家駿著《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及潘日明神父著《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等資料記載，1728-1762年，至少有二十三名傳教士和教師在聖若瑟修院工作和任教。

1728-1762年聖若瑟修院教師一覽表

序號	姓名	國籍	在院時間	備注
1	楊若翰	葡國	1728	創辦人
2	塞格依拉(Sequeira)		1728	創辦人
3	秉多	葡國	1728、 1737	創辦人
4	胥孟德(Joseph Labbe)	法國	1728- 1731	創辦人
5	賈保祿(Giampaolo Gozani)	意國	1732	於此死亡
6	遊瑪諾(Manuel Pereira)	澳門	1739	於此死亡
7	麥西蒙(Simão d'Almeida) ⁽²⁸⁾	葡國	1751- 1762	副司鐸， 1762年下 獄被放逐 至里斯本
8	路易士·德·塞蓋拉		1757	院長
9	孔斐理(Philippe Gonzaga)	交洲	1758	於此發願
10	陳方濟(Francisco da Silva)	葡國	1759	於此發願
11	李若瑟(José da Silva)	葡國	1761	於此發願
12	紀類思(Luis de Sequeira)	葡國	1762	耶穌會團 長，於此 被捕
13	費德尼(Devis Ferreira)	葡國	1762	聖堂牧師 於此被捕
14	歸瑪諾(Manuel de Aguiar)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15	西方濟(Francisco da Silva)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16	西若瑟(José da Silva)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17	法安東(António Falcão)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18	習安東(António Simões)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19	甘瑪諾(Manuel de Carvalho)	葡國	1762	於此被捕
20	穆安東(Antonio Saverio Morabito)	意國	1762	於此被捕
21	法方濟各(Francesco Folleri)	意國	1751- 1762	學院司庫 於此被捕
22	許方濟(François da Cunha)	中國	1762	於此被捕
23	杜興福(Symphorien Duarte) ⁽²⁹⁾	中國	1762	於此被捕

1762年至19世紀中葉，修院儘管三次變更主辦修會，但仍有不少歐籍人士在此任教。如1784年湯士選主教聘請了曼努埃爾·科雷亞·瓦倫特(Manuel Correia Valente)神父、若昂·奧古斯塔斯·維拉和果阿碩朗(Chorão)修院的兩名學生來校任教⁽³⁰⁾，修院由果阿拉撒路教士曼努埃爾·科雷亞·瓦倫特擔任院長。⁽³¹⁾又如1823年，講授葡萄牙文、拉丁文的教師若瑟·巴蒂斯塔·德·米蘭達、

利馬因被指控為邁卡主義者而被撤職。⁽³²⁾另外，陳神父(Raymond Aubin)、韓納慶(Robert Hanna)、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李拱振(José Nunes Robeiro)、明諾(Pierre Vincent Marie Minguet)、馬爾記諾·雷特(Joaquim José Leite)⁽³³⁾、米蘭達(D. José Joaquim Pereira de Miranda)、博爾雅、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畢學源(Caetano Pires Pereira)、趙若望(João Castro Moura)、南彌德(Louis François Marie Lamiot)、陶若翰(Jean-Baptiste Torrette, C.M.)、顧神父(Danicourt)、孔神父(Daguin)、李若瑟等先後在校任教。⁽³⁴⁾上述教師中主要是法國和葡國遣使會士。上文所提及的薩賴瓦在任職修院期間，搜集了大批早期澳門史資料，為龍思泰撰寫《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積累了豐富史料。龍思泰在該書1832年版自序中稱：“耶穌基督的北京主教薩賴瓦閣下(Dom Joaquim Saraiva)，在居留澳門期間，供職於王家聖若瑟修院(Royal College of St. Joseph)。他直到1818年臨終以前，一直進行令人難以置信的堅持不懈的努力，苦心孤詣地搶救了大量與澳門有關的瀕於毀滅的資料。”⁽³⁵⁾

作為遠東的天主教中心，在18-19世紀，澳門教區的幾任主教與聖若瑟修院亦關係密切。如第六任孟主教於1752-1772年在位，因葡“政府下令驅逐耶穌會士，沒收教產，關閉聖若瑟修院，乃憤然於1765年離澳回葡。”⁽³⁶⁾第七任祁主教，1772-1789年在位，“一生敵視耶穌會士，曾上書清乾隆帝，極盡詆毀耶穌會士之能事。”⁽³⁷⁾他於1780年回葡國述職後未返澳。第十一任柏主教，1841-1845年在位，“早於1802年來澳傳教，曾任聖若瑟修院院長。”⁽³⁸⁾第十二任馬主教，1845-1862年在位，“1825年來澳，就讀於聖若瑟大修院，晉鐸後，留澳工作。”⁽³⁹⁾第十四任明德祿主教，1884-1894年在位，“早於1872年來澳工作，曾任修院院長及副主教，……1890年，獲政府批准，重新聘請耶穌會士來澳，掌理聖若瑟修院，起草政教協定。”⁽⁴⁰⁾

二、生源

根據不完全統計，1728-1762年，在聖若瑟修院學習過的學生至少有十二人。

1728-1762年聖若瑟修院學生表⁽⁴¹⁾

序號	姓名	籍里	入院時間	學制
1	鄒若瑟	澳門	1749	初修
2	艾若望(球三)	中國	1743	初修
3	崔保祿	中國	1749	初修
4	楊方濟	中國	1737	初修
5	李瑪竇	中國	1733, 1737	初修，神學
6	卜文氣	法國	1732	學院
7	聶若望	美國	1737	學院
8	馬約瑟	葡國	1737	神學院
9	孟由義	葡國	1737	神學院
10	傅作霖	葡國	1737	神學院
11	穆若瑟	葡國	1751	神學院
12	駱尼閣	法國	1754-1756	神學院

1784年10月修院重新開學後，有中國學生12名。1815年有學生26名。1831年有學生22名。這是《早期澳門史》的作者龍思泰於1832年留下的記載。龍思泰為同時代人，於1797-1835長期僑居穗澳兩地，應該說他的敘述可信度是較高的。他在談及1784-1831年間聖若瑟修院的生源情況時稱：“年輕的中國人，數量不超過十二名，被接納進入修院，獲取必須的知識。如果他們真誠地表示想要成為神甫的願望，那麼對他們的實施的教育將他們領上這條道路。但候選人得到第一個聖職一般需要十年的時間。(……)教師講解葡文和拉丁文語法、算術、修辭學、哲學、神學等等。很多居民的孩子進入該校，儘管其中很少有人會成為神甫。這裡有時還教中文、英文和法文。每月能為其子女支付一小筆膳宿費用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修院，學習真正的葡萄牙語，有時還能體驗到心靈的昇華。有的學生在修院就餐，晚上回家與家人團聚。有的在特定的時間前來聽講，由教師“免費授課”。1815年，有八名年輕的中國人，兩名馬來人，十六名在澳門出生的男童，住在該院。1831年，修院中有七名

年輕的中國人，兩名來自馬尼拉的男童，其父為葡萄牙人，以及十三名在澳門出生的學生。”⁽⁴²⁾

到道光初年，修院共為遣使會培養了三十三名中國籍神父。⁽⁴³⁾上述表明，修院的生源，除澳門本土外，既有中國內地，又有葡萄牙、意大利、馬來西亞、法國、菲律賓等國家的學生，修院成為向中國教區培養、輸送傳教人材的重要培訓基地。

三、辦學情況

關於修院的辦學情況，首先是重視神學教育，修院“研究神學，教授葡文、英文、拉丁文等”⁽⁴⁴⁾，“神學仍然是一門重要課程”⁽⁴⁵⁾，在澳門各修院中（含聖若瑟修院），“有不少來自中國北方的青年學生，他們在那裡的任務是學習拉丁文和神學，認為將來返回故鄉從事宗教活動。”⁽⁴⁶⁾其次是重視漢學研究，修院成為澳門漢學研究的基地。再次是重視科技與世俗教育，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的一些史料中已露端倪。如汪兆楹在《澳門雜詩》的〈小三巴寺〉云：“西洋測天象，學徒出三巴。”又稱：“今小三巴寺內有學堂，齋舍嚴整，學徒猶眾。”梁喬漢在《港澳旅遊草》的〈風土雜詩二十五〉中亦言及：“蒙養修義尚恤貧，善門教澤溥如春。地名義塾三巴仔，就學年來過百人。”反映了修院注重實用科技的學習和學生人數較多的實際情況。⁽⁴⁷⁾長期居住於澳門的龍思泰，在研究早期中葡關係與澳門史時，留意到聖若瑟修院的辦學情況，在其著述中對此着墨較多，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記載。⁽⁴⁸⁾他談到修院的辦學情況時指出：“現在進而敘述主要學府，那些躋身社會上層者的子女，在其中一如既往地良師的引導下處身智力發展的源泉之地。——我們指的是王家聖若瑟修院。它的創辦者是耶穌會士，但當他們1762年被驅逐之後，修院的活動也告中斷，直至二十多年後他們放逐期滿，才告恢復。里斯本的宮廷於1782年將這一機構改變為‘佈道團修院’（Congregation of Missions）。1800年，才最後確定由議事會支付其費用。”“修院所屬的教士全是生於歐洲的葡萄牙人，一般有六個，其負責人由歐洲派遣。這一學術機構的首要目的是向中國提供熱心傳道的教師。”⁽⁴⁹⁾

另據1834年5月《中國叢報》報道，聖若瑟修院擁有一所葡文印刷廠，並裝備了一套漢字活字。次年8月有西人從廣州前往澳門訪問，看見澳門教堂和傳教士數量很多，稱“聖若瑟學院正處於其鼎盛期”⁽⁵⁰⁾。1861年馬塔主教招聘了兩名耶穌會士主持修院工作，當時“修院有100名寄宿學生”。⁽⁵¹⁾

評 價

澳門聖若瑟修院作為中國一所早期創辦的知名教會學校，它在中國教育史、西學東漸史尤其是天主教入華傳播史上，主要貢獻有下述三點：

一、該修院以培訓中國籍修士為重要職責，成為向中國內地傳播天主教的重要的人材培訓基地，來華天主教會士依靠澳門的天主教教育和中國內地的傳教實踐相結合的辦法培養中國修士。如上引龍思泰所述，1815年共有二十八名學生在修院學習，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及澳門的佔二十六名；1831年有二十二名學生在修院學習，來自中國內地及澳門的有二十名。耶穌會被取締後，遣使會士接管了原屬耶穌會的澳門聖若瑟修院，為了培養華籍會士，他們從中國內地挑選少年修士前往澳門聖若瑟修院培養。湯開建教授在經過考證後指出：“到道光初年，該院共為遣使會培養了三十三名中國籍神父。這一時期明確在澳門學習中文而又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西教士還有駱尼閣、孟振生、董文學、秦神父及蘇神父等五位法國人，其中四位為遣使會士。1784年，聖若瑟修院重新開辦後，澳門培養中國教士事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再一次成為中國教區輸送人材的重要基地。”⁽⁵²⁾茲舉三例佐證此事：1820年，四名在華出生的神父：Simao Tchang Pires、Mateus Chen de Sequeira、Marcos Li和Bartolo Meu，被派到澳門聖若瑟修院繼續學習神學。⁽⁵³⁾1835年，法籍會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接替薛瑪寶主持蒙古西灣子教務後，仍積極為澳門聖若瑟修院準備修士。⁽⁵⁴⁾在江南方面，亦有五名華籍司鐸為聖若瑟修院所培養。修院還“有一筆專供江南教

區司鐸生活的基金及其利息”⁽⁵³⁾。因此聖若瑟修院在基督教入華傳播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修院的創立極大地促進了澳門科技教育與世俗教育的發展。一方面，聖若瑟修院尤為注重拉丁語、神學、科技和數理科目的學習，重視科技教育，以便教士憑藉先進的科技知識，贏得清朝統治者的好感與重用，有效地開展傳教活動。林家駿稱聖若瑟修院“兼授數理及科學，有時為適應本地的需求，另設商科、海員訓練班和其它學科。”1862年，新設立澳門航海學校，開設貿易課程，該校附設於聖若瑟修院。根據葡萄牙國王命令，1881年聖若瑟神學院進行改組，仍保留航海和商科課程。⁽⁵⁶⁾因之，有論者認為：“該修院的創辦，是澳門科技教育的重要開端。”⁽⁵⁷⁾聖若瑟修院在澳門教育史上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它倡導平民教育，除了培養教徒外，修院也招收世俗青年進校學習，以因應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材的需求，劉羨冰稱：“還有一點不相同的，就是聖若瑟修院還兼收外讀生。就是說，沒有修道志願的世俗人家的男童，可以來讀書。二百多年來，它的外讀生幾度有較大的發展。”⁽⁵⁸⁾可以說，聖若瑟修院“開啟了澳門世俗教育的歷史，為培養澳門政界和商貿人材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播下了科技教育的種子，對促進中國科技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⁵⁹⁾

三、修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聖若瑟修院培養了一批有影響的雙語精英。試舉三例，如江沙維神父（1781-1841），是一位19世紀上半葉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於語言學和辭典編纂方面）而聞名歐洲的葡萄牙學者，他於1814年始在聖若瑟修院主講拉丁語、英語、漢語和音樂等課程，為澳門培養了一批傑出的雙語人材。他編寫的漢語教材、創新的教學方法、主編的多種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如《拉丁語法》、《葡漢字典》、《漢葡字典》、《洋漢合字彙》、《拉漢小字典》、《拉漢大字典》、《漢字文法》等，以及撰寫的《中國藝術》，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叢報》認為他於1828年編印的《拉丁語法》“是為聖若瑟修院的學生學習拉丁文而編的”，他工作非常投入，“每天辛勤工作十六至十八

個小時”。作為當時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1841年9月江沙維神父的去世，使“漢學研究少了一位主要的支持者，葡萄牙失去了一道最燦爛的光芒”⁽⁶⁰⁾。又如第一位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少年時期就讀於聖若瑟修院，其最大貢獻就是用中文編著了《外國地理備考》一書。⁽⁶¹⁾曾就讀於聖若瑟修院的學生後來前往歐洲和印度留學，不少人成就卓著。如：1814-1820年在修院學習的土生葡人吉列梅·若澤·安東尼奧·迪亞斯·彼加多，前往科英布拉大學深造，後來成長為著名學者；名醫萊奧卡迪早年就讀於修院，後到果阿潛心攻讀醫學，成為一代名醫。洛雷羅有十六個子女，其中路易斯、彼得羅、弗朗西斯科、愛德華多四人曾於1840年進入聖若瑟修院學習。⁽⁶²⁾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聖若瑟修院以其培養的一批雙語精英，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據《澳門的教堂》一書記載，為了彰顯澳門聖若瑟修院的“高度文化和極其優秀的教師，專門為這個機構發行了一枚單獨的硬幣，同時也因它達到了大學水準，而再度出現了聖保祿書院的黃金時代。”聖若瑟修院作為澳門的第二所高等學府、早期創辦的著名的教會學校和培訓中國傳教士的基地，儘管從1728年創辦後就屢遭停辦，歷盡坎坷，但它仍以頑強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壯大，為澳門社會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培養了一批雙語人材，對天主教在華的傳播和18-20世紀澳門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註】

- (1) (23) 詳見〈文化司署耗資八百萬重修，後日對外開放，聖若瑟修院教堂煥然一新〉，載《澳門日報》1999年12月1日。
- (2) 1604年中國耶穌會傳教區成立，1618年成立副省。詳見〔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頁794、799，中華書局1995年版。
- (3) 見註(2)上揭書下冊，頁341。
- (4) 〈〈王室制造〉——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Dom 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之指示〉，引自吳志良著《澳門政治發展史》附錄五，頁351，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 (5) 文德泉(M. Teixeira), “The Church in Macau”, R.D. Cremer: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UEA Press Ltd, Hong Kong, 1987, p. 42.

- (6) 林家駿著《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頁19，澳門主教公署1982年刊印。
- (7) [蘇]約·阿·克雷維列夫著《宗教史》(上卷)，頁28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 (8) 關於聖保祿學院與澳門教會教育的研究，可參見拙著《明清基督教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列入嶺南文庫叢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刊於華中師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五)，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9) [葡萄牙]施白蒂著同名書頁54，澳門基金會1995年版。
- (10)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頁24，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 (11) 同註(9)前揭書。
- (12) 榮振華前揭書，頁509-510。乘多(Manuel Pinto, 1690-1743)為葡萄牙神父，於1719年抵華。
- (13) 文德泉前揭書 p. 42。
- (14) 潘日明神父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頁38，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
- (15) 載《澳門雜誌》1999年12月第13期，頁54。
- (16) (17) 林家駿前揭書〈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和〈澳門聖堂史略〉，頁21、15。
- (18) (19) 施白蒂前揭書(16-18世紀)，頁187、183。
- (20) 轉引自吳志良著《澳門政治發展史》〈附錄五〉，頁356-35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 (21) 林家駿前揭書〈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頁21。
- (22) 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19世紀)，頁129、179、224，澳門基金會1998年出版。
- (24) 載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頁398，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 (25)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頁165-166，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金國平、吳志良著《東西望洋》，頁317-319，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版。
- (26) 龍思泰前揭書，頁178。
- (27) 根據費賴之、榮振華、施白蒂和潘日明前揭書整理而成。
- (28) 據榮振華前揭書，頁20-21，麥西蒙於1718年生，1765年在葡萄牙聖·儒蓮堡去世。
- (29) 杜興福於1708年11月12日生於杭州，為助理修士，1767年從葡萄牙聖·儒蓮堡獲釋後被流放至意大利。見榮振華前揭書，頁196。
- (30) [葡]文德泉著：《澳門及其教區》第3卷，頁668。
- (31) [葡]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83。
- (32) 潘日明前揭書，頁154。
- (33) 雷特於1801年5月20日抵澳門，1852年6月25日逝世，在澳門生活了五十一年，“在他擔任修道院長時期，教會司鐸團活動頻繁，並向澳門的青年人開放。”詳見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3。
- (34) 參見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頁535、538、599，澳門基金會1999年版；葉農：〈遣使會管理時期的澳門聖若瑟修院：1784-1856〉，載《澳門歷史研究》(第一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2年出版。
- (35) 龍思泰前揭書，頁6。
- (36) (37) (38) (39) (40) 林家駿前揭書。
- (41) 參見前揭費賴之、榮振華書之各人物傳。因為很多學生名單未列入傳記，故這一統計是不完整的。本表參考了湯開建刊於臺灣《漢學研究》2002年第2期的論文〈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
- (42) 龍思泰前揭書《公共教育》，頁51。
- (43) 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24；張澤著：《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頁214，臺灣光啟出版社1992年版。
- (44) 王文達前揭書，頁116。
- (45) 馮增俊前揭書，頁61。
- (46) 耿昇：〈法國遣使會士古伯察的入華之行與中法外交交涉〉，載《暨南史學》創刊號，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 (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六)，頁859、846，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48) 龍思泰前揭書，頁6，作者還言及修院的生源數量、來源地及課程設置情況。
- (49) 龍思泰前揭書，頁50-51。薩賴瓦(1765-1818)，生於葡萄牙，1787年12月加入遣使會佈道團，1804年成為北京主教湯士選的副手。由於清廷“禁教”，他一直未能前往北京，留在澳門擔任聖若瑟修院的教職達十四年之久。
- (5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頁43-44, Vol. 4, 頁292-293；湯開建、陳文源、葉農前揭書，頁14、36。
- (51) 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146。
- (52) 全(41)湯開建前揭書。
- (53) 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23-24。
- (54) [法]樊國陰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之〈北京傳教事業衰敗〉，頁146、160、166，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版。
- (55) [法]史式徽著：《江南傳教史》(第一卷)，頁93-95、109，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 (56) 林家駿前揭書〈澳門天主教教育事業的發展〉，頁19；潘日明前揭書，頁181；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147-148、224。
- (57) (58) 馮增俊主編：《澳門教育概論》，頁61-63，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59) 劉羨冰著：《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頁36，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
- (60) 詳見 *Chinese Repository* 1838、1844、1846、1849年有關江沙維神父的報道；參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前揭書頁58、162-163、172-177、188-191。葉農：〈19世紀上半葉活躍在澳門的葡籍漢學家——江沙維神父〉，載《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九)，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
- (61) 劉羨冰前揭書，頁38-45。
- (62) 施白蒂前揭書(19世紀)，頁23-24、122-123、179。
- (63) 《澳門的教堂》，頁80，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出版。